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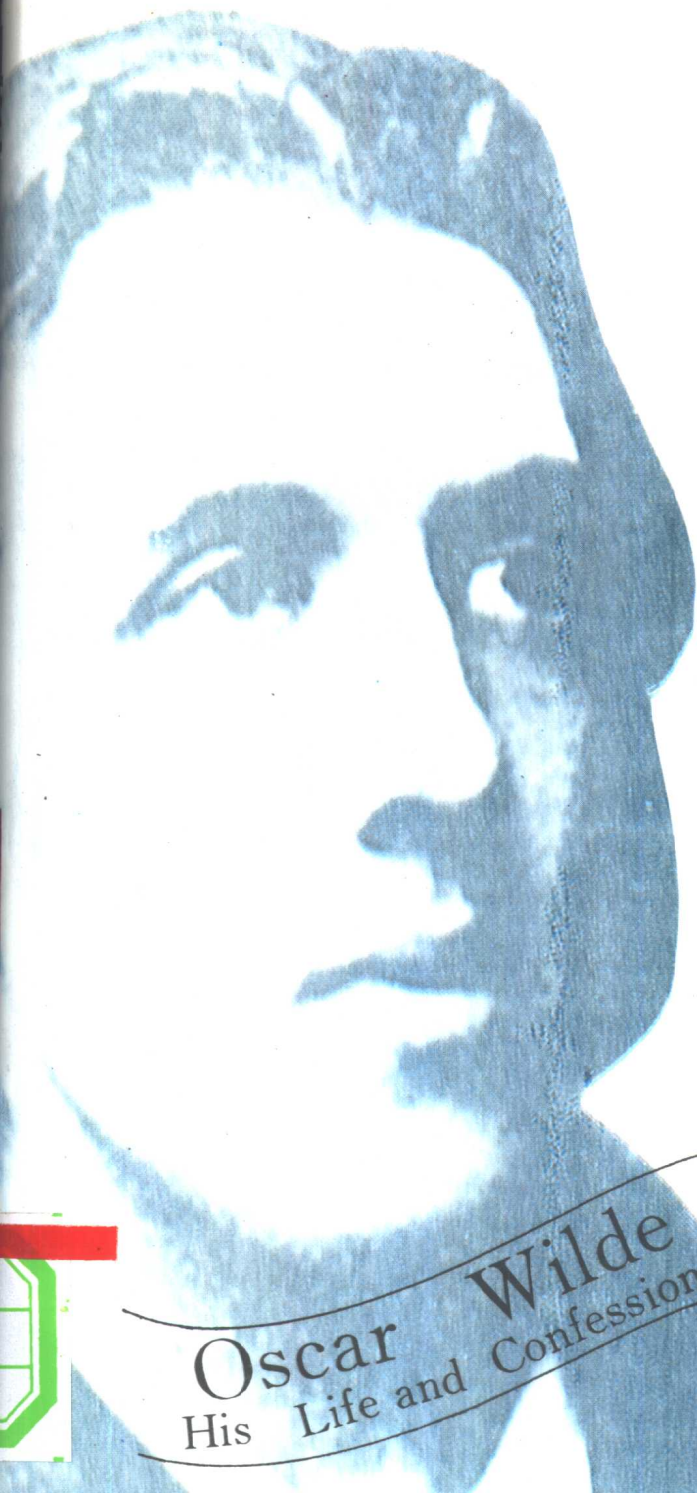
奥斯卡·王尔德

(爱尔兰) 弗兰克·哈里斯 著 蔡新乐 张宁 译

包括迄今尚未出版的
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
勋爵的《完整的、最后
的自白》和萧伯纳的《回
忆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His Life and Confessions

传



奥斯卡·王尔德传

包括迄今尚未出版的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完整的、最后的自白》和萧伯纳的《回忆奥斯卡·王尔德》

(爱尔兰)弗兰克·哈里斯 著 蔡新乐 张 宁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Oscar Wilde
his life and confessions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30

奥斯卡·王尔德传

(爱尔兰)弗兰克·哈里斯 著

蔡新乐 张宁 译 责任编辑 刘玉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郑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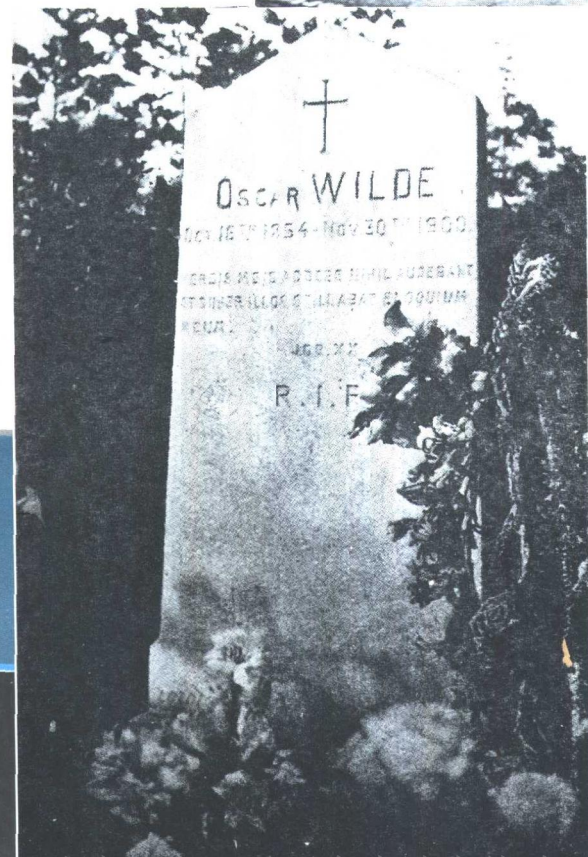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390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15—03615—4/I·500 定价 20.00 元



奥斯卡·王尔德(左)和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摄于约 189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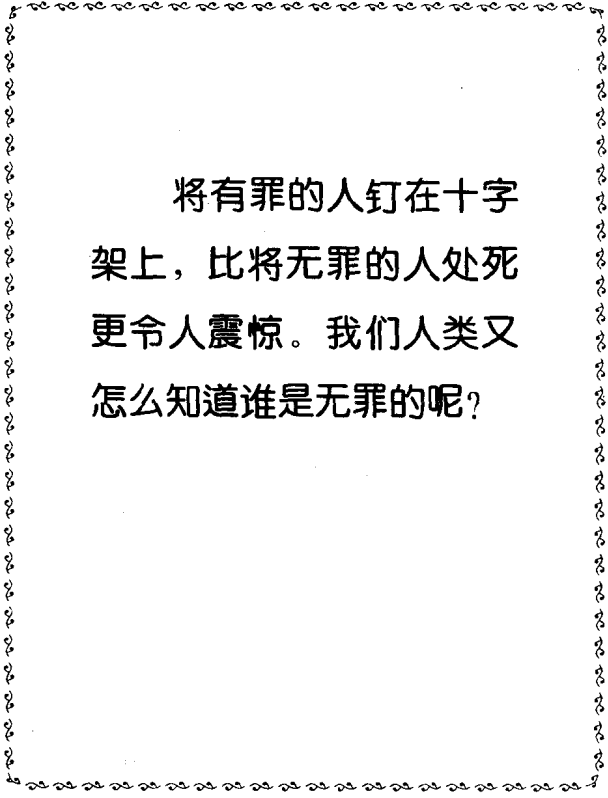


奥斯卡墓

內容提要

奥斯卡·王尔德是一位才分极高的唯美主义作家。他曾以爱尔兰人特有的无忧无虑的自信活跃于名流荟萃的伦敦社交界，潇洒自如的翩翩风度、风笛般的嗓音、梦幻般的朦胧、机智幽默的谈吐为他赢得了金钱和声誉。而生活中的他独立不羁，无视伦理道德的约束，对自己的情感过分放纵，时时流露出对别人隐隐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最终成为唯美主义的殉葬品。因与道格拉斯勋爵的同性恋一案引发了一场诉讼，后被判罪入狱，从此身败名裂，令人遗憾地过早结束了非凡的艺术创作生涯。

本书作者弗兰克·哈里斯是王尔德的好友，一向崇拜他的文才和人品，认为他具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艺术家的身躯”。他历经数年，收集了大量有关王尔德的一手资料，走访了曾与王尔德过从甚密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名流以及崇拜者，包括大文豪萧伯纳、安德烈·纪德在内，详细而又细腻地描述了王尔德短暂的艺术创作生涯和颇为隐秘的情感历程，再现了清教主义的英国社会的虚伪和不公。书前有一封长达数页的信，是道格拉斯勋爵的最后的忏悔和独白，很完整。书后附有萧伯纳回忆王尔德的短函，另有王尔德本人的短诗和十几封写给道格拉斯勋爵的信。许多资料都系国内首次披露，弥足珍贵，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大文豪王尔德的一生，进而思考作家与社会、艺术与道德、艺术与人生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将有罪的人钉在十字
架上，比将无罪的人处死
更令人震惊。我们人类又
怎么知道谁是无罪的呢？

1990年我在英国雷丁大学学习期间，一个周末，随好友迈克驾车外出游玩。当车行至雷丁火车站附近时，迈克指着路边的一片建筑对我说：“瞧，那就是曾关押过王尔德的雷丁监狱。”透过车窗，只见暗红色的高墙上架着电网，紧闭的大门旁站着警卫，几幢灰色建筑的顶部在高墙后隐约可见，在英格兰冬日灰白的天空下，这片建筑悄悄地卧在那里，乍看并不引人注目，然而我知道，由于王尔德的一首《雷丁监狱之歌》，它早已成为雷丁城最著名的景点了。

奥斯卡·王尔德，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一个能言善辩、妙语联珠的演讲家，一个个人品行令人诧异，遭人非议的“焦点人物”，在19世纪末的英国，他以自己惊世骇俗的文艺主张、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大起大落的坎坷命运，构成了英国文坛上的一个独特景观。

在文学史上，人们通常把王尔德看作英国唯美主义

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在王尔德之前，英国的唯美主义运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发端于1848年的前拉斐尔派运动首先在绘画界提倡以真挚的感情去描绘不带功利与道德色彩的自然的美；画家兼诗人但丁·迦百列·罗塞蒂、诗人斯温伯恩等人继而在文学创作中贯彻这一主张；文艺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和瓦尔特·佩特在他们的一系列作品中宣传“美的永恒规律”，提出艺术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灵感，寻求美的享受的观点，号召用艺术的“美”否定现实生活中的“丑”；作家、装饰艺术家威廉·莫里斯把艺术看作改造社会的手段，鼓吹把艺术和美推行到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这些作家、艺术家们的理论鼓吹与创作实践使唯美主义运动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形成了一定声势，成为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相抗衡的一个文艺流派。而王尔德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步入文坛的。

王尔德在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罗斯金的讲座，接受了唯美主义的文艺观点。走出校门后，他融汇吸收了前人的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唯美主义理论。“为艺术而艺术”是唯美主义的主要口号，也是王尔德文艺理论的核心。他在《道连·格雷的画像》自序中说：“艺术家是美的作品的创造者。艺术的宗旨是展示艺术本身，同时把艺术家隐藏起来。”这段话包括了他对艺术的对象和目的的认识。既然艺术的宗旨仅仅是展示艺术本身，那么一切非艺术的即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当然就排除在艺术

所反映的范围之外了，艺术反映现实、反映人生就是不可能的了。王尔德要求艺术采取超功利主义的态度，认为任何牵涉到世俗利益的东西都是不美的，都不能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在艺术作品中，也不应当有说教训诫的东西存在，因为抛开了现实世界的一切，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因此，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美”。

王尔德认为艺术的目的是创造“美”，“美”与人生没有利害关系，艺术决不应该模仿现实的人生，而人生反倒应该受到艺术的影响和改造。艺术家运用想象力从非现实中创造了“美”，是为了使人生艺术化、美化，艺术不是生活的镜子，生活倒是艺术的镜子，人生模仿艺术才是正道。他举例说，现代的悲观主义都是从哈姆雷特那里来的，自从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创造出了这种性格的典型，悲观主义才得以在世上流行。

与他的创作目的论相一致，王尔德提出了对创作本身的想法。他说：“人们创造艺术作品的快乐，完全是个人的快乐。他不管世人怎样评论而创作。我从事创作，因为它给予我最大的快乐，与他人全无关系。我的作品若能使少数能理解的人得到欢欣，我就满足了。即使人们不欢欣，我也不感到痛苦。”为了使自己在创作中了无挂碍地享受创作的快乐，他说：“艺术家是离了题材而超

然的。离题材愈远，艺术家愈能自由自在地观照和创作。”他追求的就是一种纯粹超然的艺术创作状态。

在王尔德生活的 19 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世纪末”情绪。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极大地推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在摧毁着许多传统观念的基础，诚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在一片惶惑疑虑的气氛中，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严重的精神危机，对社会现实极端不满，于是纷纷寻找各种精神寄托。王尔德曾说：“我们是一个动荡、疯狂的时代的产儿，在这绝望和沮丧的致命时刻，叫我们往哪儿逃，往哪儿躲？只能到安全的美的洞窟里去，那里随时可以获得许多欢乐和少许陶醉；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伪经所说的神界之域中去，那里至少可以暂时忘却尘世的一切纷扰和恐怖，也可以暂时摆脱我们在世上遭到的悲惨命运。”他之所以走上唯美主义道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当时文艺界盛行拜金主义、艺术作品日益庸俗化、商品化现象的抗议，是对虚伪与假道学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反抗。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王尔德不仅是唯美主义理论的积极鼓吹者，而且还是这种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的文学作品大都构思奇妙，展示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也体现出他极力贯彻唯美主张的努力。《道连·格雷的画像》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他用一幅精美传神的肖像画作镜子，映照出人心中善与恶、美与丑的矛盾与

斗争，尽管小说的情节荒诞离奇，远离现实生活，但它所揭示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分裂状态，却能给读者以启发。王尔德的童话写得很美，他的一些优秀童话不仅想象奇特，结构精致，而且还显示了王尔德内心的同情与怜悯之情，一篇《快乐王子》就足以使他让人们永远记住。王尔德的才华还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他用法语创作的剧本《莎乐美》，词藻瑰丽，比喻新奇，语言富于音乐节奏感，华美的舞台场面与变态的人物性格，营造了神秘、阴郁的浪漫气氛，被视为唯美主义的戏剧代表作。他的社会问题轻喜剧，以诙谐的格调、机智的语言，描画了上流社会的庸俗生活与道德危机，曾受到人们的广泛好评，其中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又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是最早被搬上中国话剧舞台的外国戏剧之一。

王尔德的作品数量不算多，分量也不够重，按照习惯看法，他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规模上，都算不上“巨著”，但是，王尔德出色的文学才华还是得到人们承认的。他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活跃丰富的想象力，他驾驭各种体裁的能力，以及运用语言的高超技巧，都显示了他可观的艺术创造潜力，他同时代的人曾很有信心地期待他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可惜的是，狭隘的唯美主义主张局限了他的艺术视野，抑制了他的艺术潜力的发挥，而轻狂散漫的生活态度则招致卫道士们的攻击，使他的生命过早被毁灭。

唯美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强调把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唯美主张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王尔德就是唯美主张的身体力行者。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他曾常穿一身色彩艳丽、式样奇异的所谓“美的服装”，胸前佩带象征“美”的百合花或向日葵花，肩披长发，手拿花手绢，目若无人地出入街市，向人们展示“美”，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后来，当他成了文化名人，有了名声与金钱，就日益沉醉于感官的享乐，对社会舆论与道德规范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态度，最后终因同性恋被法庭判刑，入狱两年。王尔德的命运，虽然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当时英国社会与司法界的愚昧、保守、虚伪、假道学，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王尔德的命运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既如何处理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作为人类心灵之路的探索者，文学艺术家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属灵的、浪漫的、先锋意识的、个性化的、不受羁绊的等特点，而现实的社会体制及其统治者、管理者，则大都具有务实的、守成的、规则化的、群体性的、求稳少变的、甚至是保守滞后的等特点，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一般情况下，这种冲突仅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而在个别情况下，冲突也可能突破思想文化范围，发展为具体行动上的极端现象，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种悲剧多有所见，王尔德的命运仅是其中一例。如何处

理好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的关系，是人们至今仍未解决，将来还将面临的一个问题。

在王尔德出庭受审时，人们还耻于提到“同性恋”一词，涉及到此种事情，人们只是用“不道德的行为”来指称。当时，仅凭指认一个人是同性恋者，法庭就可将其判罪，而信件与诗歌都可被当作重要的罪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时隔一个世纪，今日西方各国的同性恋者不仅可以合法地公开活动，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地上街游行，抗议社会上某些人对他们的歧视。当我在伦敦街头偶遇由几百个同性恋者组成的游行队伍时，曾不由地为王尔德惋惜：假如他活在今天，定不致于因同性恋而入狱，葬送掉大有前途的艺术生命。不过转念又想，假如他活在今天，也有可能因其它违逆今日社会秩序的行为而受罚，这事谁又说得了呢？于是，思路又转向了这个难解的矛盾：艺术家与社会。

《奥斯卡·王尔德传》的作者弗兰克·哈里斯是王尔德的同时代人，曾近距离地目睹了王尔德的成功与毁灭。他对王尔德的才华非常欣赏，对王尔德的命运深表同情，对英国司法界乃至整个上流社会在王尔德案件中所表现出的卑鄙、虚伪与不人道表现出极大愤怒。作为一个作家和编辑，哈里斯深知王尔德所具有的艺术潜力，因此，他为这颗文学之星的过早殒落倍感痛惜；作为王尔德的私人朋友，他又对王尔德的个人品行颇为不满，指出了王尔德本人在他悲剧性命运中所负的不可推

卸的责任。哈里斯对王尔德的态度，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称这部《奥斯卡·王尔德传》是他跪着写出来的，这反映了他的深切感情与矛盾心理。这部《奥斯卡·王尔德传》是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虽然带有作者本人的一定感情色彩，但材料丰富翔实，观点亦基本公允可靠，它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具体地了解王尔德其人、其书，而且有助于启发人们对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这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吧。

吕伟民

1995年10月15日

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最后完整的自白书》

在开始叙述奥斯卡·王尔德和艾尔夫雷德·道格拉斯之间亲密的关系之前，我要纠正一下二卷本《奥斯卡·王尔德——生平及其自白》第一版中某些微小的错误。

我将根据事情发生的顺序进行更改，我希望这样能使读者跟我一样信服这个已经修改的故事。

1925年2月，雷吉·特纳（他在王尔德临终的最后几个月一直跟随其左右，特别是在其最后病重时，日夜守护着他直到最终时刻）来到尼斯，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故友一样聚在一起。他祝贺我写出了最优秀的王尔德传。他还客气地说，这是我们语言中最优秀的传记之一。

我呢，赶忙公正评价，告诉他说，我所做的跟他对王尔德无私的照料不可同日而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道学家们给我设置了障碍。我跟他说，臭名昭著的美国道学家协会的头面人物撒玛曾经通知我，由于我在书中使用了“鸡奸”一词，他将告发我。他宣称，假若这个词出现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封信里，依然是一样的结果。“这个词极端粗野，必须删除。”

撒玛第一个告诉我，美国的邮局如何变成了一个专利式的道德检查所，有权拒绝邮寄任何不体面或者淫秽的书籍；事实上，

还可以告发企图利用邮局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人。我于是为此作了调查，拜访了美国邮局的律师（也可能是助理律师）哈罗德·康坦特先生，将撒玛的非议讲给了他。他笑了笑，要我留下一本书给他，他将在几天内向我讲明他的意见。一周之后，他来信要我去找他。一见面，他就说：“一个人要尽到责任，是不会太愉快的。不过，我读您的书真是享受，所以一定要向您祝贺。太精彩了，它为一个特殊人物及其时代描绘出了一幅至为生动的图画！”

“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我问。“我认为此书写得恰如其分。”他答道，“但我若是您的话，书末一段我是会删掉的。但即使这样，我也会放过它的。但若从欣赏方面讲，我真希望您删去几行，把王尔德死时场面删掉。”他说着便翻到了他提到的那一页，其中写道：

“当两位友人（罗斯及特纳）坐在床边，沉浸在悲痛和焦虑之中时，一声巨响传了过来，只见粘液从奥斯卡的口中、鼻中喷射出来，……连床上的用品都要烧掉。”

这是罗伯特·罗斯的精心描述。他告诉我，奥斯卡的肠中之物尽数吐到了床上，臭味熏天，他感到非常恶心，于是不得不留下雷吉·特纳清扫房间，烧掉床上物品。他体力难支，甚至无法帮他一把。

在哈罗德·康坦特的建议下，我告诉特纳我删去了最令人不快的细节，所以对雷吉有些不公。

“我很抱歉，”我说。

“不必道歉，”特纳说，“因为整个情节都是罗贝的捏造。”

“这是什么意思？”我惊叫道，“没有发生过巨响吗？”

“根本没有。”他答道，“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想写信告诉你，那是个最大的失误。我听说故事是罗斯讲的，我想细节肯定来源于他，但那全是无稽之谈！”

“上帝啊！”我惊叹，“他为什么给他的朋友编造出这样丑恶的